

【文化杂谈】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读《温家宝地质笔记》有感

□叶小文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关键，是如何淬炼、积聚，使之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民气、民风、民魂，成为我们时代的精气神。

“天人合一”的概念，有宏大的气象，有实在的目标。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和扩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如《易经》所说，天有天之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高地远，难在务实。天荒地老，最忌空谈。“天人合一”有赖于“知行合一”。

十六世纪初王守仁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上下下工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

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今天我们倡导的“知行合一”的真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一代又一代地努力。强调实践，重在实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天人合一”要求经天纬地的胸怀和气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要求不畏艰难困苦，奋斗永不止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关键，是如何淬炼、积聚，使之

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民气、民风、民魂，成为我们时代的精气神。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请读地质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本好书——《温家宝地质笔记》。

温家宝，大家都知道他曾 是共和国的一代总理，却不知他是如何在艰难的磨砺中“玉汝于成”的。这本书，有原始的记载。温家宝同志18个年头在地质系统工作留下的45个封皮陈旧的笔记本中，包含着他对地质现象的观察和描绘、对地质工作的实践和认识、科学考察的经历和收获；也有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激励。

我对地质不通，也难读懂全书。但信手翻开那一页页影印下来的笔记，就不禁肃然起敬，叹为观止了。你看，那每一字、每一行、每一页，都一丝不苟、清秀工整、细致缜密，而且，不是一页两页，是整整45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从青年到中年，一心一意埋头于地质工作，

18载春夏秋冬，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奔走探寻，在荒野寒舍夜深人静时研修苦读。多少次风餐露宿的磨砺，却能吸天地之精华；多少回艰难困苦的淬炼，留下这一本本记录。

作者说，“它们来自于神奇的大自然和艰巨的地质工作”，“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矿时”。这不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吗？那一丝不苟、清秀工整、细致缜密的一行行、一页页、一本本笔记，可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记录。

作者说，它们“是我用双脚走出来的”，“我平静而从容地直面各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前行和攀登，从未退缩。我坚信，不畏艰难困苦的人，终会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不就是“知行合一”的精神吗？那一丝不苟、清秀工整、细致缜密的一行行、

一页页、一本本笔记，可以说正是“知行合一”的轨迹。

这本书有温度，你分明感觉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君子之德，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本书有厚度，你分明感觉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浩然之气，以力拔千钧之势席地而去。

作者说，“我感谢培养我成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原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当年共和国的一任总理，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锻造与积聚中奠定基础的！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文坛名家】

□温儒敏

曹文轩的古典情怀

他是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的。他大概不适合炒作，或者不忍心去炒作。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可喜可贺。这几天有记者采访，想了解一些曹文轩轶事。我多少有点忌讳“我的朋友某某”之类的联想，但也想写点有关文轩的文字。

曹文轩和我同一个专业，平日话不多，但可以无话不说。从1981年开始至今，断断续续，我们有二十多年毗邻而居。最初是在北大南门21楼，筒子楼一层，单身教工宿舍。其实很多住户都已拖家带口，因没有分到住房，只好带着“集体户口”挤在这里。每家只有一间小屋，10平方米，做饭就在楼道，家家门口都有一套灶具，煤油炉或者煤气罐什么的，整个楼永远弥漫着油烟饭菜的混合味。我住北屋，文轩住过道斜对面南屋，他门口不摆灶具。那时他年轻，天天吃食堂，而且经常不在家。有时就把钥匙给我，我正好可以到他屋里去看书写字。

文轩出生在苏北农村，小学刚上完，就遇上“文革”。好在他父亲是老师，有点“家学”，硬是让孩子自学到相当不错的程度，尤其是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写作的才华被开发出来了。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北大读书，先是在图书馆系，后转入中文系，因为写作出色，几年后又选拔留校当老师。他1977年留校，而我是1978年才进北大读研究生，虽然我比他七八岁，还要称他师兄吧。

后来我在校园里搬过几次家，文轩也住到离校较远的驱子营。直到2000年，清华南边的蓝旗营建起了高层宿舍，我们才又搬到同一栋楼，他住我楼下。那时能分到三居室是很奢侈的，文轩还专门在卫生间弄了一个桑拿室，在我看来有点稀奇。文轩是很会享受生活的。我的外孙女一两岁时，在电梯有时见到“曹爷爷”，会有点



曹文轩

“害怕”。我们说，这是“专门给孩子讲故事的作家爷爷”，也不顶用，还是“害怕”。也许在孩子眼中，“曹爷爷”太了不起了，令人敬畏。

文轩总那么斯文，衣着大都是名牌，西装外边随意套一件风衣，走路撩起风来，很是潇洒。他是系里最早买车的，很贵的车，每到过年，他就开车回苏北老家。我问他，那么远途累不？他说中途休息一下就好了。还是那种潇洒。他很讲礼仪，没有作家常见的那种我行我素甚至故作粗俗。你求他办事，他会很认真，不糊弄。我几乎从未见过文轩生气，我至今想想不到他动怒会是什么样子。系里开学术委员会，难免有人会“本位”一点，给自己的教研室或者学生争利益，有时就会发生争辩。文轩就会和颜悦色地两边做工作，息事宁人。

文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做当代文学研究，出过好几本专著。他写过一本《思维论》，试从哲学角度去解释文学现象，我粗读过，认为还是下了工夫的。文轩的确读过大量的书，包括一些很难啃的国外的理

论，他希望能有突破。但这本书在业界影响并不大。他的另一本《小说门》也是讨论理论的，但不回避感性，常把作家的感受带入到文学形式和手段的论说中，非常到位。其实那是文轩讲课的结果。我没有去听过他讲课，但据学生说，课上他会朗诵自己的作品，会让你感受到某种童心，那一定非常有趣。

文轩大概曾想把创作当副业，用更多精力做文学理论和批评，但在大学还是以研究为主，创作是不被看重的。每年填表也只要求填发表的论文，文学作品上不了“台面”。但创作的欲望是很难禁锢的，文轩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红瓦》、《草房子》成了当代儿童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曹文轩也成为文坛的一面旗帜，甚至进了作家富豪榜，他的学者身份就越来越被作家声誉所掩盖了。能一手做批评，一手搞创作的学者型作家并不多，曹文轩显得有点特别。在中文系，现在都得对曹文轩另眼看待。

文轩很早就出版文集。大约10年前，他的文集出版时，在蓝旗营南边的万圣书园召开过小小的座谈会，但规格很高，王蒙、李书磊等作家、学者都来了。我在会上有过简短的即席发言，后有记录整理，大意如下：

曹文轩的文章风格大概不会大红大紫的，不适合太消闲的阅读，那种浮器粗糙的“重口味”在曹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我理解的曹文轩并不那么热闹，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另类，有些寂寞，他是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的。他大概不适合炒作，或者不忍心去炒作。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我最喜欢曹文轩作品中对

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他习惯写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总是非常细致认真地观察描写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包括种种迷惘与困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天真的灵魂在社会化、成人化，还有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本真。读这样的描写，我们也许会感到忧伤、无奈，会想到我们自己有过的某些美好的东西也是就这样消失了。但



我们为这些美好的回忆感动，这些最能体现人性中美好的方面，可能就会与我们周遭许多机械的、沉闷的、肮脏的生活形成比照。曹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对人性美的关怀。现在到处都在讲什么“终极关怀”、“普遍价值”，可是文坛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表现污浊的东西，连儿童文学都在追求暴露、颠覆、调侃，好像谁要是喜欢冰心、孙犁，谁就是“前现代”的。所以，曹的作品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关怀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作品纯净、向善的风格，反而显得可贵。

曹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们也常常退回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这有

点类似读沈从文，可以在他那梦幻般美丽的湘西山水中做一番白日梦、一番精神体操。不过，沈从文是要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构筑“希腊小庙”，曹文轩则更现实一些，更贴近生活一些，也容易被接受与认同。

几十年前，有一个批评家提出一种文学的理解，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浪漫的，一类是古典的。他认为的所谓古典，就是健康的、均衡的、常态的、符合普遍人性的；而其他创作，则是浪漫的、偏激的、病态的、走极端的，因此也是非人性的。他对“五四”及后来的文坛的偏激很是不满。这个人就是梁实秋。对梁氏的理论当然可以讨论。但在这里我愿意借用他的说法来评说曹的创作。可以说，曹文轩的小说都是古典的追求，这使得他在这个社会和文坛上显得有些另类。

我想，什么时候人们能够更多地欣赏纯真的文学，能够领略真正的悲剧，我们这个文坛连同我们的读者、出版家，就可能比较常态、成熟和健康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